



[quintessence]

最好的时光

摄影：Thomas Fuesser 采访：周轶

有天夜里，我们听着崔健的歌，有人起身走向窗台点了根烟，在座不少的都禁不住流泪了。



戴汉志·(柏林)中国先锋艺术展策展人 1993年·北京

20年前，他架起相机和灯架，在几间简陋的工作室里用胶片记录下一群创作中的中国年轻艺术家们。

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时代尚未注意到他们——这批日后中国当代艺术的先锋人物。而他们的青春和理想就此长久地定影在这位德国摄影师的记忆中。

Thomas早年在德国埃森大学主修传播与设计学，毕业后当了三年的摄影助理，“汲取”种种摄影技法。拥有自己的工作室之后，开始接拍广告，为杂志做平面设计。又因着一次契机，为全球顶级的电影摄影师拍摄肖像，从而在德国摄影界建立了一定声名。

说起拍摄这组中国当代艺术家肖像的故事，Thomas从1993年初柏林的中国先锋展开始，编年体式地把大事件摇过了个镜头，直到2013年5月，肖像影集《Short Cuts》出版。

“多少年了，我一次次将这组相片拿给出版社、画廊的人看，他们要不是压根没兴趣；要不就是有人想做，但无奈找不到资金赞助。最后我确实失望了，把这些原件都收到大箱子里……”

相片没有恒久地被封存下去，相继在上海、北京的香格纳画廊展出——“借‘中国当代艺术’之名”（Stolen Treasures from Modern China）。人们不禁要问“一个西方人真能借走中国的文化吗？”

《生活》：请你谈谈拍摄这组肖像的机缘？

Thomas：我当时在汉堡的工作室，接到一通从柏林House of Culture来的电话，说他们正在举办名为中国先锋艺术的大展，荷兰籍的戴汉志（Hans van Dijk）是此次展览的策展人。于是我就和助手一起前往柏林拍摄这群来自东方的艺术家们。

拍摄结束后我正要离开，看到好些工作人员在清场，像是有一位神秘的嘉宾要出现。我就折回展厅，前等后等，终于看到一行人走来，不料是著名的画商Leo Castelli。有人就笑言：“Leo Castelli是专程从纽约飞来柏林，一日往返，就是为这个中国的先锋艺术展。那你更应该专程走一趟中国，进一步记录这群年轻的艺术家们？”我其实从未想过要去中国，经他这么一讲，便决定随同戴汉志，在当年9月踏上前往中国的旅程。我们一到北京，就见到《纽约时报》鼎鼎有名的记者Andrew Solomon和马格南图片社的摄影师Gueorgui Pinkhassov，他们也是专程赶来，作有关中国先锋艺术家群体的报道。

《生活》：您最早是通过什么方式了解中国的？

Thomas：早年对中国的了解很少，印象中就是几部电影吧。十一二岁在纽约第一次看中国功夫片。然后就是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有王家卫的。

《生活》：那到了中国之后，与想象中的中国落差大吗？

Thomas：视觉上是有些不太一样。但我最深的感受是，当时的德国并不了解中国，更不了解中国的当代艺术，在认识上存在着不少盲区。1993年之行开启了我对中国全新的认识和体验，此后我尽己所能地去矫正不少德国人的观点和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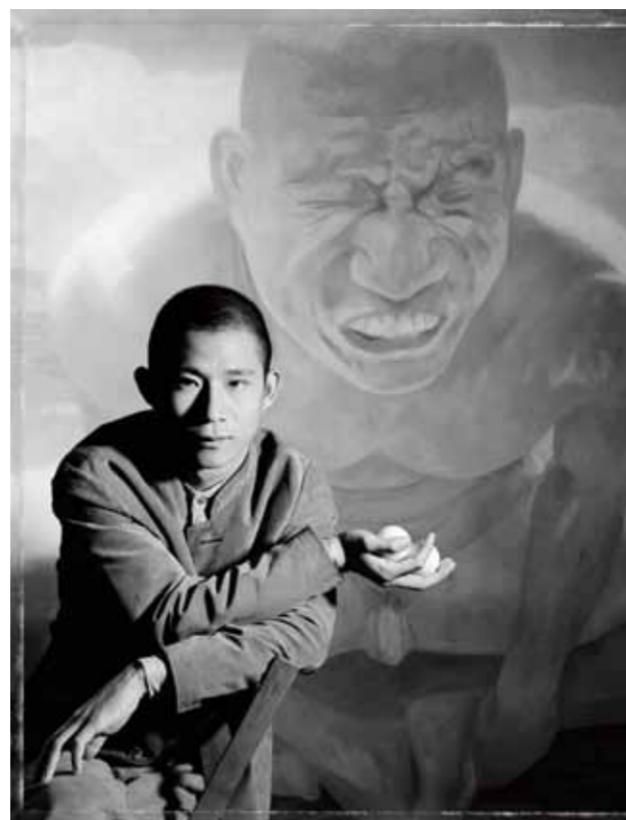
《生活》：谈谈那段时间在北京拍摄的故事吧？

Thomas：一到北京，戴汉志就招呼所有的艺术家来到故宫，我就在那为他们拍了几张合影。随后几周，戴就陪着我到他们的画室，去他们的家。戴跟他们很熟悉，他的中文特别好，为我们翻译。我也常去找这些艺术家吃饭、聊天，看他们画画。当时只有一两位可以用英语交流。跟其他的艺术家就只好比划着，实在不行就画画，用简笔画来沟通，确实挺有趣的！

时代的关系吧，虽然已经开放了，但可以看的东西仍旧不多。记不得谁说，拿到了一本美国的电话黄页也翻来看。那时候，他们要是不是一门心思在工作室作画，就是聚在一起聊着哲学、美学、自己的创作。生活也挺拮据的。好像除了王广义吧，已经有人开始订他的画了，所以他是唯一有自己的房子的，就只是一个大大的房子，还没添什么家具。



曾梵志 1995年·汉堡



上左：崔健的歌词 1993年，北京
上右：方力钧 1993年，北京
下：刘安平和朋友 1993年，北京

《生活》：你又在德国拍摄了几位中国艺术家，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Thomas：1995年，受汉堡文化局邀请，有几位艺术家在Kampnagel Halle-K3参展，叫“Der Abschied von der Ideologie”。栗宪庭是这次展览的策展人，受邀的有曾梵志、吴山专、王广义、吕胜中等。那儿离我的工作室很近，所以他们常来。有天夜里，我们听着崔健的歌，有人起身走向窗台点了根烟，在座不少的都禁不住流泪了。

《生活》：你1993年就在柏林见到崔健了，随后又在北京拍摄他和他们的乐队，谈谈崔健吧？

Thomas：崔健的影响至今还是很深，三年前德国有他的演出，怕是有五千多华人从欧洲各地赶来，专为听他的歌。很多人在现场就哭了。几个留学生对我说，他们父母年轻时就听着崔健写的歌，他唱出了那一代人内心深藏的遗憾和一种无奈吧。

《生活》：在这群艺术家中，你个人比较欣赏的是谁？有长年保持联系的吗？

Thomas：我挺喜欢吴山专的作品，他的东西你需要静下来，花一点时间去感受，去反思，包括和他太太Inga共同创作的作品，都很棒！画作不是消费品，是艺术。就像烹饪，烹饪是一种艺术，但吃不是。吴是那群艺术家中的烹饪高手！（笑）做菜和游泳是他生活中很重要的两件事。

曾梵志、吴山专他们，我们在汉堡就挺多走动的。时常联系的还有丁乙、周铁海他们。

《生活》：听说有不少朋友说你傻，当时怎么不收藏几件他们的画作呢。你自己是怎么看的呢？

Thomas：我们周遭有两类人：狩猎者（hunter）、收藏者（collector）。我肯定不是后者。对一个艺术家来说，终其一生真正出彩的不过十来件作品。他们确实有三两张画作很棒，想卖给我，是出于一种情谊吧，当时就开了几千美元的价。我就算知道这些画会翻倍地增值成一堆“天文数字”，也不可能去转手卖了，绝对行不通！

就像我当年自费去中国拍摄，我去并不是为自己索取什么利益的，而是和他们一块儿，一起发掘些什么。也是这个原因，他们也很信任我。

《生活》：2009年，你的这组肖像摄影作品在香格纳画廊展出——“借‘中国当代艺术’之名”（Stolen Treasures from Modern China）。是头一次对公众亮相吧？

Thomas：2008年，Chris P. Gill（李云飞）对我这组作品很感兴趣，就想着是不是要出本画册。他也跟Karen Smith提起，Karen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书，她建议先做个展。我便跟周铁海、Lorenz Helbling联系。随后大家达成一致，将主题引向中国当代艺术史。当然我们并没想去讨论一段历史，只是能从中窥见一些历史的轨迹。比起英文的“偷”，中文用“借”就斯文一些，我们想中文名就礼貌些吧。

《生活》：回顾20年，这个拍摄项目对你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Thomas：一句话：它改变了我的人生！不然我不可能会来中国，更不会住在中国。我护照的居住地就是上海。每次过海关，要填写来访中国的缘由，绝大部分老外都写“访友”、“工作”，但我就照实写“回家”。关警看后笑答：“欢迎回家！”

《生活》：未来有什么新的创作项目？

Thomas：高士明说过很妙的一句话：“有三代外国人参与了中国艺术。第一代在墙上打了个洞，第二代造了一座桥，第三代建了一座美丽的宝塔。”我算是参与了一部分。我计划在上海和纽约搭建一个比较成熟的艺术交流平台。这些年来，也积累了一些关系，想在纽约开始一个短期进驻项目。两三年内，就可以邀请年轻的艺术家去纽约交流。我还开始了一个新的拍摄计划，是关于当下年轻的艺术家。我想通过镜头去比较中国前后两代艺术群体，从不同层面去分析这种异同。

《生活》：你曾说“我不喜欢上海，我爱上海！”（I don't like Shanghai, I love it!）你现在也居住在上海，这些年的具体实际生活中，对中国又有怎样的认识？

Thomas：很多人问我喜欢上海的理由，我讲不清楚，就像爱上了一个人。就好像一段感情（笑），像两人之间的恋情，也有七年之痒。其实去年很挣扎，我说我和我的上海有了“婚姻危机”，我难以面对人们内心的漠然，日益扭曲的价值取向。每每听到年轻人说类似“我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要骑在自行车上笑。”都让我很无措。这种强烈物质化的观念很可怕，人们生活在商业化虚无的谎言中，盲目去追逐名牌、奢侈品，对其他事物却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些转变实在太大了，实在太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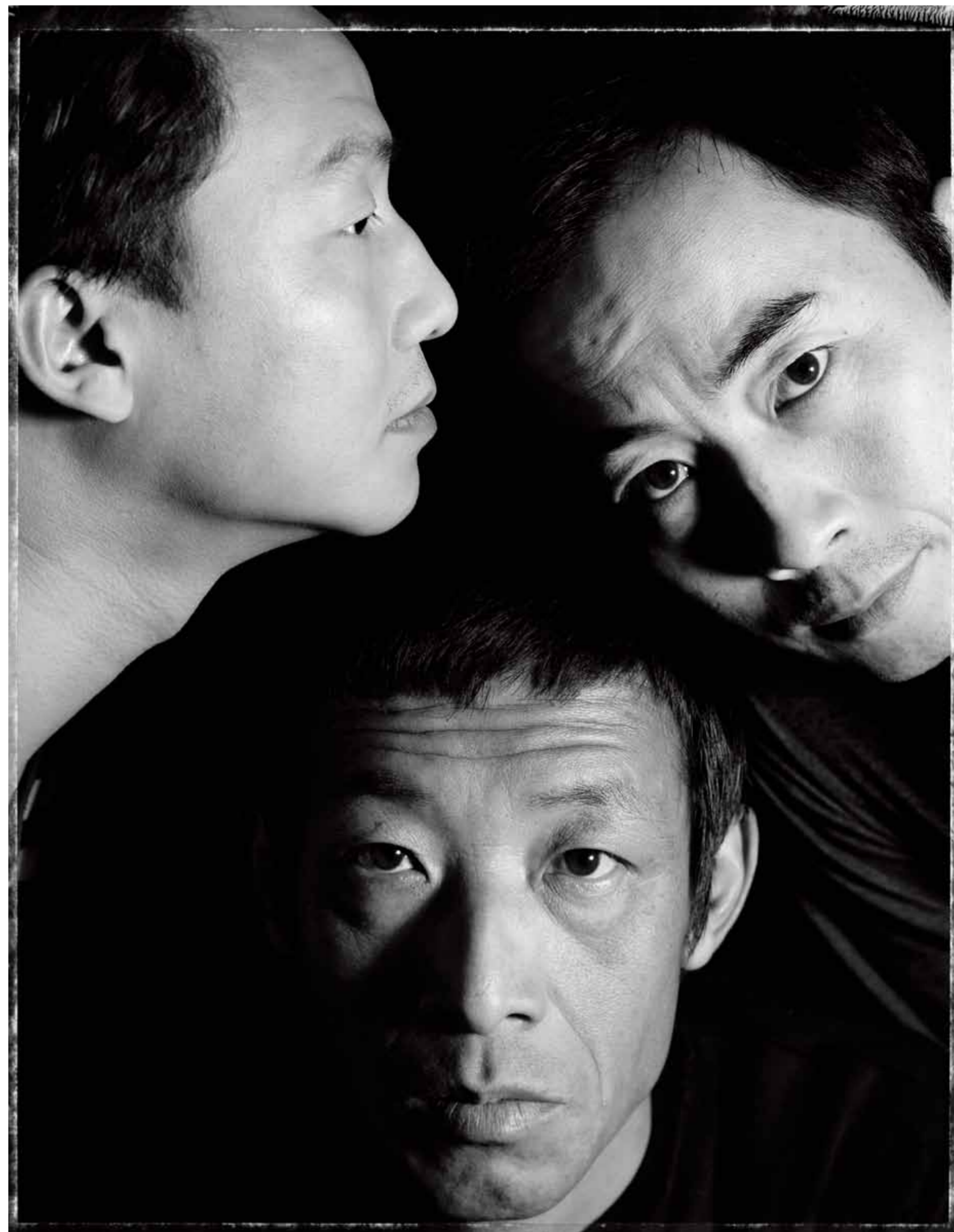
《生活》：对中国的未来有什么样的看法？

Thomas：未来，未来在年轻的这一代。我曾在珠海一所高校授过课，很在意当下的年轻人。曾经那个书籍稀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学生有太多东西可以看，互联网、种种新生的媒体使人们茫然，不知道该从中吸收些什么。

我们有能力建一座美术馆，但如何去充实这个美术馆？（We can build a museum, but how to fill it?）人们总把这些问题丢给政府，其实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还是观念吧，需要有一种声音去唤醒人们，尽管有时候会觉得很无力。

托马斯·福瑟 Thomas Fuesser

1960年出生于德国埃森，毕业于埃森大学传播与设计学专业。现居于上海和汉堡。1986年起从事摄影，同时为诸多杂志做平面设计。1992年，“光的大师”肖像摄影在柏林艺术学会等地展出。2009年，“借‘中国当代艺术’之名”在香格纳画廊展出。2013年，摄影展“SHORT CUTS”在香港巴塞艺术展、上海当代艺术馆等地展出。



上左：戏剧车间 1995年·汉堡
上右：吴山专 1995年·汉堡
下：王劲松 1993年·北京

新刻度小组 1993年·北京